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诗歌通史

赵敏俐 吴思敬 主编

宋代卷

韩经太 主编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赵敏俐 吴思敬 主编

中国诗歌通史

宋代卷

韩经太 主编

撰稿

韩经太

张剑

孙海燕

王培友

王维若

马东瑶

吕肖奂

谭琼

琼

魏学宝

李盼

刀文慧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诗歌通史·宋代卷/赵敏俐,吴思敬主编;韩经太等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058-7

I. ①中… II. ①赵… ②吴… ③韩… III. ①诗歌史—中国—宋代 IV. ① 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7048 号

责任编辑 葛云波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校对 葛云波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891 千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53.25 插页 2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058-7

定 价 1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绪 论	1
一 两宋高度繁荣的社会文明	1
二 宋代诗人独特的文化气质	5
三 宋人的诗学思想与审美理想	9
四 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宋词	18
五 唐宋诗之别与唐宋诗之合	23
第一章 宋初诗坛的历史因革	25
第一节 宋初唱和风气与白体诗	25
第二节 宋初隐逸诗人与晚唐体诗	33
第三节 西昆体派与《西昆酬唱集》	43
第二章 欧阳修及其同时代的诗人	52
第一节 梅尧臣的诗学思想和诗歌创作	52
第二节 欧阳修(上):宋诗典范的寻求与选择	61
第三节 欧阳修(下):平易流畅的艺术风格	73
第四节 苏舜钦诗境的诗歌史意义	84
第五节 王安石诗风的演变及其诗律诗艺讲求	96
第三章 台阁雅词与柳永词	112
第一节 台阁词人与闲雅小令	112

第二节 词境的开拓与复归	128
第三节 柳永生平及浪子情怀	141
第四节 柳永词的内容及艺术成就	149
第五节 柳永词的地位及影响	166
第四章 北宋理学诗派	174
第一节 “理学诗”的概念与发展历程	174
第二节 邵雍的“邵康节体”	183
第三节 周敦颐、程颢、张载的性理诗	195
第四节 理学诗派的影响	205
第五章 苏轼的诗学思想与创作成就	216
第一节 苏轼的生平与思想	216
第二节 苏轼诗歌创作理论与审美追求	225
第三节 求物之妙、辞达无隐的诗歌艺术	236
第四节 苏轼的文人词创作	261
第五节 东坡词的艺术成就	271
第六章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282
第一节 黄庭坚的生平与思想	282
第二节 黄庭坚的诗学思想	285
第三节 黄庭坚的诗歌艺术	294
第四节 黄庭坚与江西诗法	314
第五节 品杂雅俗而词格倔强的黄庭坚词	320
第六节 江西诗派的形成及其主要诗人	331
第七章 苏门诗人与词人	354
第一节 苏门诗人的共同艺术追求	355
第二节 苏辙的诗歌主张与创作特色	358

第三节 张耒和晁补之的创作面貌	370
第四节 复雅归宗、情韵兼胜的秦观词	386
第五节 语意清新的贺铸词	395
第八章 词宗清真与“易安体”	402
第一节 周邦彦生平及清真词概述	403
第二节 清真词的艺术特色	410
第三节 李清照生平与易安体	423
第四节 李清照的《词论》	433
第九章 南渡诗词的发展态势	440
第一节 南渡诗歌的主题	440
第二节 吕本中“活法”论诗与诗歌创作	447
第三节 南渡诗人之冠:陈与义	456
第四节 绍兴诗风的典型特征	464
第五节 南渡词坛的整体面貌	473
第十章 中兴诗坛	488
第一节 爱国诗歌传统中的陆游	488
第二节 陆游诗歌的多样性风貌	499
第三节 杨万里、范成大的爱国诗篇	513
第四节 道学一脉与“诚斋体”	523
第五节 范成大:农家诗与田园诗的整合	536
第十一章 辛弃疾与中兴词人群体	547
第一节 辛弃疾生平:英雄·能臣·词人	547
第二节 稼轩词的英雄主题	556
第三节 稼轩词的艺术特色	569
第四节 稼轩词史的地位及影响	586

第五节 中兴词人群体	595
第十二章 四灵诗派与江湖诗人群体	610
第一节 四灵诗派的诗歌主张与创作实际	610
第二节 江湖诗派的众多诗人	622
第三节 江湖诗派及其诗歌理论	632
第四节 江湖诗派的艺术特色	656
第十三章 诗家别派	671
第一节 理学家诗的性理与性情	671
第二节 僧诗和道诗	684
第三节 《沧浪诗话》与严羽诗艺	697
第十四章 姜夔与吴文英词	711
第一节 姜夔生平及白石词概述	711
第二节 “清空”词境与白石词艺术特色	720
第三节 梦窗词的题材与风格	734
第四节 梦窗词独特的词史地位	750
第十五章 遗民诗人群体	764
第一节 遗民诗人群体概述	764
第二节 遗民诗人群体的诗歌内容	769
第三节 遗民诗人群体的诗歌艺术	778
第十六章 遗民词人群体	787
第一节 宋末词人结社概述	787
第二节 周密与《绝妙好词》	798
第三节 王沂孙的咏物词	807
第四节 张炎其词与词论	818

目 录

第五节 刘辰翁与蒋捷的创作	830
后 记	844

绪 论

历时三百余年的两宋时代,以其拥有的高度繁荣的社会文明,造就了中国诗歌史上继唐诗以后的另一个高峰。两宋诗坛群星闪耀、流派纷呈,作为特定时代历史主体的宋诗作者,以特有的丰富学养、忧患意识、思辨理性和谐谑性情,构建为独到的文化气质,从而表现为宋诗意蕴丰厚的人文风致。宋诗,就这样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文化生态环境中,展开了它文化诗学与艺术诗学双重意义上的创造性实践探寻。两宋时代,因此而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个富有魅力的结点:宋诗成为和唐诗并峙的另一高峰;宋词更成为“一代之文学”。缘此而形成的宋诗经典,以其别样的魅力,始终是中国古典诗学讨论和诗艺切磋的中心课题。

一、两宋高度繁荣的社会文明

宋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邓广铭先生尝言:“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后世的元明之所不能及。”^①无论从哪个方面展开讨论,学界均能就此达成共识。也正是因为两宋以其政治、经济、科技、学术成就所构成的社会文明,“千年之前,不仅在当时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宋学也是独领风骚的巍巍高峰。”^②所以,宋人才自觉地表现出“集大成”的思想文化意识,唐人“集大成”的文化艺术精神,实际上是通过宋

^① 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② 方健:《宋文渊海,学林大观——写在〈全宋文〉即将刊行之际》,《宋代文化研究》第十七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人的思想阐释而得以生成其观念形态的^①。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对宋代社会文明的总体认识,其实早就表现为宋人自己的文化自信,朱熹尝言:“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②史尧弼又曰:“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③陆游亦云:“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④宋人对本朝文化有如此自信的认识,足以构成其坚实深沉的时代精神。

对于中国文学史研究来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当然是首先需要关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北宋时期已然形成完备的文官体制一事,便是一件具有丰富文化意义的历史大事件。建宋伊始,鉴于安史之乱二百年来的方镇强权,宋太祖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天下,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⑤于是,不但宰相需用读书人,就连掌兵的枢密使也多由文人担任。同时又实行相对宽松的言论政策,两宋历任皇帝皆把“誓不杀士臣及言事官”^⑥视为祖训。苏轼《上神宗皇帝书》即证实云:“历观秦、汉以政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⑦这种从宋初即推行的“崇文抑武”措施,一直延续了两宋王朝三百年。作为宋初统治者的本意,显然首先是培育容易驾驭的各级政治代理人来取代飞扬跋扈的武人,而在不经意间却孕育出有宋特殊的文官政治文化。《宋史·文苑传序》对此总结道:“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⑧时至今日,但凡研究政治史、文化史者,只要论及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性壮大,以及相应的历史主体性作

^① 参韩经太:《宋诗学阐释与唐诗艺术精神》,《文学遗产》,2011年第2期。

^② 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0页。

^③ 史尧弼:《策问》,《全宋文》,第217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8页。

^④ 陆游:《吕居仁集序》,《全宋文》,第222册,第340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三,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93页。

^⑥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光绪广雅书局本。

^⑦ 苏轼:《苏轼文集》,卷二十五《上神宗皇帝书》,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40页。

^⑧ 脱脱等:《宋史》,卷四三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997页。

用，都会高度重视所谓宋型文化的这一特点。

和文人政治相适应的是，宋王朝十分重视文治教化。印刷术虽然发明于隋唐，但宋初以来，雕版印刷术才获得普遍的使用，这使书籍的撰著和流通大大超越前代。景德二年（1005）真宗至国子监阅书库，问邢昺书板几何。昺答：“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①内府之外，私人的藏书也动辄万卷，于是宋代出现了以私人藏书为对象的目录学专书《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与此同时，两宋学校设遍天下，中央设有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地方有郡学、府学、县学；民间有书院、乡校、家塾。像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学术中心，由此便形成了崇尚文化的社会风气。^②

既有文官政治的社会特色，又有注重文治的文化政策，由此而必然产生崇尚文教的社会风气，于是进而濡染浸润，导致宋诗整体上的书卷涵养气息。与此相关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是自在情理之中而不待申说的。

在中国文明史上，真正堪称哲学思辩时代者，先秦之外，只有魏晋与两宋，而两宋的创新独造之处，是在哲学上将传统的儒学发展成为具有心性哲学特色的理学。程颐谓：“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③这里标志以“知道者”的“儒学”自然是指宋代特有的理学——或谓之新儒学。新儒学之发展，主要由北宋周敦颐、邵雍发轫，二程、张载等扩充，后以南宋朱熹集大成，至此，儒学历经千年的演变，臻于极高明而尽精微的“理学”境地。尽管我们都知道“理学”实际上是孕育并生长在“宋学”的大语境之中，尽管朱熹集大成之际也存在着“朱陆之争”，但在整合而言的意义上，“理学”所以成就其高明精微境界的思想生态环境，乃是儒、释、道三教并重的社会思潮。真宗曾撰《崇释论》称：“释氏戒律之书，与周、

^① 脱脱等：《宋史》，第12798页。

^② 具体论述可参曾枣庄：《文史哲齐头并进，两宋之世华夏文明登峰造极》，《光明日报》，2009年第5期。

^③ 程颐、程颢：《二程遗书》，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孔、荀、孟迹异而道同，大指劝人之善，禁人之恶。”^①王安石又曾对神宗说：“臣观佛书，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②如此上行下效，到北宋中叶，三教合一已成为时代思潮，例如程颐就说其兄程颢的学术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諸六经而后得之”^③不仅理学家大都以融会三教为荣，许多文士的诗文创作，亦每每可见三教合一思想的深入人心。

最后，作为政治、思想、学术等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两宋经济整体上呈现出的繁荣局面和实际上所达到的发展水平，正是当下的一个学术热点。无论如何，科学技术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持续发展，海外贸易增加扩大，使两宋时代享有了总体安定繁华的形势。加之纸币的流通、手工业和商业的兴盛，由此也带来宋代城市经济特有的繁荣。像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以及建康（今江苏南京）、成都等地都是人口达十万以上的大都市。尤其是北宋首都汴京的城市文明，无疑居于当时的世界领先地位。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所绘制的汴河沿岸车马杂沓、交易繁忙的景象，至今给人以深刻印象，上海世博会因此而以其为中国馆镇馆之宝。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黄金时期，闻名于世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项主要是在宋代得到应用和发展的。沈括是宋代主要的科技代表人物，他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有笔记小说《梦溪笔谈》和医书《良方》传世。北宋有两次天文史上著名的超新星记录。苏颂和韩公廉制造了水运仪象台和浑天仪，成为世界上第一台天文钟和假天仪。其他如农学、农业技术、建筑学等都有显著成就。北宋初，构筑横跨长江的大浮桥，为桥梁史上的创举。南宋时又广泛使用车船，应用了原始的螺旋桨，如此等等。^④而且有一个历史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宋人提倡“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诗画交融艺术，缘此而有讲求诗意的“文人画”因运而生，殊不知，就在“文人画”讲求诗意图化之际，作为新兴画种的“界画”，实则具有绘画艺术与建筑设计的双重底蕴，由此而实际展现出来的艺术科学的自觉，不啻是宋代科技发达直接有

① 宋真宗：《崇释论》，《全宋文》，第13册，第144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三，第5660页。

③ 程颐、程颢：《程颢程颐文集》，《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54页。

④ 具体论述可参王曾瑜：《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关于文学艺术的最佳例证。

总而言之,近代以来,宋代文明的价值就处于被不断发掘与阐释之中。王国维于《宋代之金石学》中称美天水一朝文化云:“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①陈寅恪于《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更是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②缪钺亦云:“赵宋一代三百余年,为中国历史由古代转入近代之契机。当时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均在蜕变之中,而尤富于开拓创新之精神。”^③如今看来,宋型文化显示出了一种知识性、思辨性、人文性、创新性、会通性等鲜明特点,正是在此等社会文明的基础之上,宋代文人形成了具有自我特色的涵养气质和审美眼光,从而使宋代诗歌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崭新面貌。

二、宋代诗人独特的文化气质

宋诗的独到造诣和独特风貌,有赖于宋代诗人特定的文化气质。

随着文人整个社会地位的提高与稳定,与唐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的沙场热情相比,宋人却云:“试取封侯印,何如笔砚功。”(欧阳修《送张如京知安肃军》)“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苏轼《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政府大力扩展科举取士名额,重用经过科举选拔而入仕者,建设以礼乐为代表的文化制度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使得通过科举而进入仕途,从而参政治国实现人生价值,在两宋是一条颇有把握的理想道路。苏轼曾记载北宋开国之初学校衰息,而至仁宗天圣年间,随着开科取士的人数扩大,蜀人“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谢范舍人书》),所以“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晁冲之《夜行》)的诗句,当不为虚景。加之书籍的丰富、学校的增设,使宋代文人的总体学术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朱熹等都是学者型的

^① 王国维:《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页。

^②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7页。

^③ 缪钺:《全宋文序言》,《文献》,1988年第2期。

作家，在文学作品之外，还写了不少经学、小学和史学的著作。深厚学术修养的积淀、长久的书斋生活，使得他们钟情于人文意象的创造，可以对人生进行深入全面的思考，并擅长作精密周详的议论，这就必然形成宋代诗人富有理趣的文化气质。赵翼《瓯北诗话》有云：“北宋诗推苏、黄两家，盖才力雄厚，书卷繁富。”^①所谓“才力”“书卷”，正是文化气质之内蕴所在。

由于文臣是国家政治重要的参与者和决策者，就很自然地激发了整个士人群体在政治上意气风发的使命感和强烈的参政热情。欧阳修所云的“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镇阳读书》），并非是他个人特有的精神风貌，多数宋代文人都是以名节自砺、以道义相期的人物。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正是当时士大夫的人格理想所在。《宋史·忠义传序》总结道：“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②加之两宋三百年间外患不断，宋代文人缘此而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诗歌中对朝政的关切不绝于缕，于是，宋人发现了杜诗的特殊价值，所谓“少陵有句皆忧国”（周紫芝《乱后并得陶杜二集》），尊杜也就成为有宋一代的共识。南渡之后持续的外患侵扰，又造成宋代诗歌中英雄主题的高扬，爱国忧时之声几乎是一个半世纪诗词的主调。

与此同时，“理学”文化意识的成长与渗透，使得士大夫阶层热衷于讲道论学，他们往往为了探寻真理而投入身心于思想辩论，所以北宋有王安石与司马光等人的新学、旧学之争，有苏轼的蜀学与二程的洛学之争，南宋又有朱熹、叶适、陈亮等人相互的论学问道。翻阅宋人文集，定会发现大量的辩难文章，这说明宋人文化气质上所具有的鲜明的理性特征。不过，热衷于理论思辨，并不等于普遍具有哲学家的素质，相对于纯粹抽象思辨的哲学讲求而言，宋世文人的诗学性情，往往表现在善于通过认真体味大自然的一景一物，来

① 赵翼：《瓯北诗话》，卷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68页。

② 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四十六，第13149页。

感悟事物的发展规律,最终以伦理道德来把握人生之道,由此形成了理智、豁达、敏锐的主体文化意识。不仅如此,启动于所谓“百代之中”之中唐时代的儒学复兴思潮,在引入释家与道家思想元素以提升自身哲学理性的过程中,相应地重新塑造了儒家理想人格。有如世人所熟知者,两宋之世,无论道学中人还是艺林中人,莫不心仪于“孔颜乐处”,并以“吾与点也”之意为孔子人格精神之亮点。正是儒学新变的这种走向,使得宋诗学思想阐释中的三代汉唐整体意义上的文明集成,意味着对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与唐人始有之“集大成”两种境界的兼容。参照秦观“后世道术为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为文”^①的论断,将苏轼“钟王之法,妙在笔法之外”的纯粹艺术评论,与其晚唐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的知人论世之艺术评论结合起来^②,最终可以发现,在人格与艺境高度统一的意义上,“高风绝尘”与“远韵”所代表的魏晋风度和晋宋雅意,恰恰是被李、杜、颜、柳之“集大成”境界所遮蔽的另一层真实面貌和另一种理想境界。实际上,认真品味苏轼相关论说,其兼取盛唐集成与晋宋超逸的意趣,是再鲜明不过的了。苏轼论唐六家书法有云:“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并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③其间殊可注意者,首先是直接将颜真卿书法比作杜甫诗歌,并称其“一变古法”而“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这说明“集大成”与“变古法”是统一的;其次,则是“体并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这又说明“并众妙”与“造疏淡”是统一的。此外,贯通其间者,即所谓“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则又是人格与艺术的统一。所有这些,显然远远大于人

^① 秦观:《韩愈论》,徐培均:《淮海集笺注》,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50页。

^② 苏轼:《书吴道子画后》、《书黄子思诗集后》,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六七、卷七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10、2124页。

^③ 苏轼:《苏轼文集》,卷六十九,第2206页。

们通常所说的宋代“文人”书画之艺术精神的相关内容,这也就是说,那种将宋人审美思想之主导精神归结为“文人”艺术精神的认识,显然是偏执的。宋诗学思想之精华,乃在“集大成”而返自然,“并众妙”而“造疏淡”,穷尽艺文能事而又尽显无意于此之萧散意趣。^①

萧散意趣,恰恰也是禅宗盛行时代的精神产物。禅宗活泼洒脱的思想风格以及融会贯通的思辨方式,对士大夫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参禅同时又是士人们在仕途风浪中的心灵安顿之地,《宋元学案·苏氏蜀学略》即说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忠规谠论,挺挺大节。但为小人挤排,不得安于朝廷,郁傺无聊之甚,转而逃入于禅。”^②所以士大夫阶层的“居士禅”现象蔚为大观,像杨亿、富弼、文彦博、张方平、欧阳修、王安石、晁补之、晁说之、李纲、范成大、杨万里等人都是染于禅佛者。《五灯会元》甚至将黄庭坚列入黄龙派的法嗣之中,黄庭坚也描绘自己的形象为:“似僧有发,似俗无尘。作梦中梦,见身外身。”(《写真自赞》)^③实际上,宋人对于释教的接受,主要是吸取其中的哲学智慧。于是,禅宗的静观物象往往成为文人的修行之法,妙悟和禅机也成为文人们执着追寻的趣味。有研究者指出“理禅融会”的现象促成了宋型文化的特质,正是在理学与禅宗的双重浸染下,宋代诗人形成了治心养气的涵养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体悟内省的思维方式和平淡恬静的审美观。^④

综上所述,优越的政治地位、优厚的物质生活和深厚的学者气质,使得宋代文人整体上形成了一种雍容不迫、安闲自在的生活态度。前后对比,我们发现宋代诗人群体上的命运观是扬弃悲哀的,他们的性情本来就得到了心性讲求与事功实践的良好调控,同时又接通释道,从而可以左右逢源,仕与隐不再是对立的两极,而如何在徜徉两端的过程中进行自我人格的修炼与完善,才是人生的最终目标。尽管身在宦海,感受内忧外患,但内在型的意义追寻和道德自律,使他们也往往感到内心的自适,从而表现出悠游从容的气质与态度。“宋诗的个体抒情往往与道德修养的自我完善相表里:诗人能够在永

^① 具体论述可参韩经太:《宋诗学阐释与唐诗艺术精神》,《文学遗产》,2011年第2期。

^②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九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87页。

^③ 黄庭坚:《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59页。

^④ 具体论述可参张文利:《理禅融会与宋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恒的道德星空下找到人生的定位与追求,便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化短视为远瞩,化悲哀为闲适。”^①于是,他们远离了前代文人那种梦幻与激情的色彩,而多有平和中正与乐观闲散的气息。透过“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王安石《北山》)式的闲情逸致的表象,窥视宋人像一个深沉的中年人似的精神世界,我们发现,他们以含蓄而深邃的人生境界,去代替唐人那些壮美雄伟的感性感觉。在文化气质的整体把握上,宋代诗人正体现出“审美意识道德功用与娱情怡性矛盾统一的时代特征”^②。

三、宋人的诗学思想与审美理想

在特定文化气质的内在规约下,宋人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诗学思想和审美理想。

文道关系论,是宋人诗学思想和审美理想的核心内容。文以载道,又是其核心内容中的首要命题。虽然,从刘勰到韩愈以来,对此已经多有议论^③,但真正高度重视“文以载道”的思想观念,还是自宋代开始的。从宋初柳开、穆修与欧阳修之发轫,到周敦颐率先提出了“文所以载道”之说,后来朱熹又对此作了更为深入的理论阐述,使得这一思想观念在宋代文坛处于统治地位。这样一来,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就成为有宋一代文学价值观的主导性认识,如苏轼《晁公遡先生诗集叙》中评价颜太初的创作:“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④其中,对文章教化功能的重视程度即超过了艺术审美功能,这也是大多数宋代文人创作思想与创作倾向自重心所在。于是,反映政弊、论说大道的诗歌作品一直成为宋诗的大端,像欧阳修的《食糟民》、《边民》,王安石的《河北民》,苏轼的《吴

^① 谢琰:《屈骚传统的失落与宋诗情感特征的形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② 具体论述可参周恩来、仪平策:《论宋代审美文化的双重模态》,《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

^③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道沿圣而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页)韩愈门人李汉《昌黎先生集序》:“文者,贯道之器也。”(《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页)

^④ 苏轼:《苏轼文集》,卷十,第313页。